



马来西亚、新加坡

社会变迁
四十年

(1965 - 2005)

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 主编



马来西亚、新加坡

社会变迁 四十年

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 主编



马来西亚、新加坡社会变迁四十年 (1965-2005)

主编：何启良、祝家华、安焕然

执行编辑：钟斯麟、洪一麟 封面设计：何婉嫣

出版：南方学院出版社 Southern College, PTD64888, 15km, Jalan
Skudai, P.O.Box 76, 81300 Skudai, Johor, Malaysia.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 Kent Ridge P.O. BOX 1076,
Singapore 911103

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 Wisma Tiong-Hua, 7th floor. No.8,
Jalan Keris, Taman Sri Terbau, 8005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电话：607-5586605 传真：607-5563306 电邮：sec@sc.edu.my

承印：康德有限公司

No.8 & 10, Jalan Rosmerah 1/4, Taman Johor Jaya, 811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电话：607-3541219/607-3548027 传真：607-3537067

出版日期：2006 年 10 月

定价：RM30 (S\$15)

Social Changes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1965-2005)

Edited by Ho Khai Leong, Thock Kiah Wah and Onn Huann Jan

©Southern College, Malaysia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 – in – Publication Data

He, Qiliang (Ho Khai Leong), 1954 -

Zhu, Jiahua (Thock Kiah Wah), 1962 -

An, Huanran (Onn Huann Jan), 1968 -

ISBN: 983-2453-16-X

1. Malaysia – Singapore – History and society
2. Singapore – Malaysia – History and society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序

祝家华

本书收集了2005年12月10日及11日举行“新马四十年来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是项研讨会让我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地的人民有机会以学术及冷静的眼光，回顾新马分家四十年来的政经文教的社会变迁，意义深远。

召开此项研讨会的缘起，要追述到2004年9月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也是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系主任李元瑾博士率团来访南方学院，在交流会上我们谈起隔年是新马两地分家四十年，应该有些活动回顾及纪念这“四十不惑”的年岁；之后经多次交流，把原要分两地举办的研讨会，缩小仅在南方学院举行。一路筹备走来，新马关系依然还是热门话题，但是“新马比较研究”学术研究这领域还有待耕耘。

新马两地的关系、政经文教的“比较”发展，一直是两国相当敏感的议题。像官方的两国领袖、外交关系、政经竞争等，都不容易“评论”；民间的课题，如两地的华文教育问题，像南洋大学，一直还是两国人民都颇为关心的议题，但还没有被深入的理解和研究。希望这些论文能让大家以学术的眼光冷静地分析两国分家四十年来的社会变迁。俗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两国不仅过去是“唇齿相依”，一直以来也都有“唇寒齿亡”的利害关系，因此

两国的比较研究，当能惠及双方的人民、国家及社稷的福祉。

社会的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人是社会和历史的主人，这句话“当然是人类中心主义”，应该批判，但在有限的时空里，人类这渺小的生物也只能这样想；至少新马两地变成两个国家，由“一家人变两个家庭”，都是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共同造成的历史。这里我要引述老调牙的马克思名言：过去的哲学家是解释世界，现在重要的是改变世界。个人以为，我们要共同创造历史（改变世界），但首先创造历史是从解释历史开始的。因此，虽然新马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已经被创造，但是未来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共同参与；当然五十年后，我们许多人或许已经不在，包括我自己，但是人类是“可爱”的生物，我们会为了自己无法触及的事物奋斗、伤心、流泪。

也许这是灵长类的特殊之处。这些文字就是深长地呼唤永不沉睡的心灵之痕迹！

如今，研讨已顺利召开及出版论文集，我要特别感谢新山中华公会领导的支持、教育委员会的配合，同时也得到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的协助，尤其是何启良博士的鼎力支持，更重要还有诸位学者的拔“笔”相助，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

导论

何启良

一、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 1963 年马来西亚联合邦成立之前都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而在 1963 年至 1965 年曾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1965 年 8 月分家后，遂成为是两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现在的马来西亚联合邦的成员是马来亚半岛、沙巴和沙劳越，领土面积横越南中国海。新加坡独立后，建立宪政的新加坡共和国，位于马来亚半岛的南端，为一弹丸小国。这四十年以来，两国政、经、文、教各自发展，各有成就，各有景观，而在两国外交关系上，时好时坏，议题的复杂性更是千头万绪。显然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不是一日之寒，彼此的互动与互惠是长期形成的。为了解决两国关系悬而未决的议题，两国政府企图想抛弃历史的包袱，往前看，但是在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又似乎在想，在历史的包袱里或许可以寻找到尚未能解决议题的答案。两国人民则来往不断，对自己的政府有所期许，对他们来说，日常生活需要稳定、经济需要发展、文化需要维护、制度需要建立，两国之间争执的考量，应该是以人民的长期利益为前提。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令人回肠荡气。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由六十年代到廿一世纪新马的漫漫四十年变迁，又岂止是岁月惊心。马来西亚从农村经济转型到工业社会再走向“二零二零宏愿”，而新加坡从

一个危机四伏的岛屿小国转变成经济成就可以傲视东亚的小龙！真正历经了这完整的四十年的一代人，出于社会关怀的追问、学术良心的求索，以及对于历史责任的考量，有进一步探讨两国个别发展特色以及互动脉络的必要。

近些年来，新马两国政治发展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在两国的学术界受到重视，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成果，但囿于所知，就此展开的两国比较研究仍十分罕见。有关专著的问世，有 Leo Suryadinata（廖建裕）编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Singapore: ISEAS, 2002）和李元瑾编：《新马华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新加坡亚洲研究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2002）。显然两国华社之间的比较，是研究者所一直努力的。2005年适逢新马分家后四十年，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和新山中华公会教育委员会策划了《新马四十年来社会变迁研讨会》，志在进一步在新马比较研究上作一分努力。现在把研讨会的论文编辑成书，其出场秩序与在研讨会上发表有些出入，主要是要照顾到论文的内容以及全书的论述脉络。

二、

第一辑收集的是有关文化与文学的论文。郑良树的〈论儒家文化在新马的开发和运用〉和郑文泉的〈新马分家对“儒家”意味着什么？〉分别阐述了儒家思想在新马百年的变迁与适应，以及其在本土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不断应变。郑良树的论文是研讨会的主题演讲。他认为，具有强大包容力和生命力的儒家思想，拥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特质。经过了历史考验和岁月的洗礼，证明了新

马两个地区其实就是儒家文化“教外别传”的典范。他同时亦指出新马在发扬儒家思想的工作上有极大的分别，在殖民地时期，儒家文化的发展以新加坡为最盛。但是在 60 年代分家之后，马来西亚华人在维护中华传统上反而硕果累累。事实上，中华文化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实得力自民间的自觉自强运动。以后新马两地的儒家思想发展命运如何，就得看后浪的劲道了。郑文泉更多时候是从政治发展史的视角来论述儒家在新马的命运。在反复的辩证后，他总结出一个儒家思想“两难”的情况：它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意义。它的消极意义在于：它是新马两地华人要求国家对族群与语文“一视平等待遇”的障碍，而它的积极意义则在于：国家的“社会价值观”同时也维系在“儒家价值观”的理论根据上。

庄迪澎在〈马新分家四十年两国中文报业演变比较〉一文中对新马中文报业发展有独特的看法。一开始他就指出大众媒体乃政治统治工具，因此它实无法摆脱其政治特质。新马的大众媒体历来与政府极度配合，结果了多年适应，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政府的监控。新马两国政府控制大众媒体的手段雷同，但是他们的执行程度、管道和效率则有差异。作者亦讨论到最近几年来大众媒体的最大演变，即网络报纸、网络博客的出现以及其影响力的持续扩大。此一议题显然将会是以后研究新马大众媒体继续关切

的。

在华文文学创作方面，新马两国各有开展。许文荣的〈有人与九九幅文学风景比美——比较马华、新华新生代的书写〉企图从四个侧面：南洋书写、地方书写、漂泊于沉默、诗与反诗来对比较新马两地的华文新生代诗人作品。他的结论是，两地新生代诗人的诗作各有千秋，水平不分

高下，互相可以媲美。关键是，在未来的路上，如何才能确保写作人能够后浪推前浪，为新马华文文坛营造出一个更丰沛、更蓬勃的大家气象？他认为，两地的大学中文系在培养写作人方面成绩斐然，且任重道远，尤其是新加坡，因为许多年轻的华文创作者都是中文系出身的。

第二辑是有关教育与语文政策的论文。教育与语文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庄永康和梁秉赋的论文都不约而同地谈论到两者之间的互动。庄永康的〈四十年来新马华人面对的“母语”问题〉论述对当前新加坡语文政策的种种。母语问题显然相当复杂（它不只是华人的问题，也是其他族群的问题），因为它不只是牵涉到教育领域问题而已，而是牵涉到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问题。作者指出，新加坡华人一方面对中文/语文需求感觉麻木，另一方面却又觉得中国崛起，实能提供给新加坡发展华文一个有利的语境；事实上，现在新加坡强调中文的实用价值，其实未尝不能增强中华文化底蕴。最后他点出了新加坡当前母语/语文发作的当前之急，即政府需拟定更细致的教育政策，以及加强更健全的“亲语文”网络。

新加坡语文政策其实是政府操作的产物。梁秉赋的〈新加坡的双语教育：1965-2005〉更具体的申述新加坡自独立以来的双语教育。双语教育是新加坡国家教育体系的“政策基石”，但是在教学的实践上，曾经经历了不同层面的争端、适应、改革；可以看出，从新加坡独立以来，随著时代需求的变化，所谓双语教育，是有不同解释的。梁秉赋认为，新加坡在语文的选择上有不同的思考，对双语教育的定位以及它们所肩负的功能和目标也有过此消彼长的考量。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状况显然与新加坡不同，尤其是华文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冯白羽的〈马来西亚华社民办高等学府的历程与展望：1965-2005〉宏观地描述了马来西亚华社民办高等学府的曲折路程。现在的三大高等学院：南方学院、新纪元学院和韩江学院，肩负着马来西亚华人办学使命和特色，而他们的未来发展，就成了华文教育发展成败的关键。冯白羽回顾了自创办南洋大学以降的华文教育发展的艰苦过去，探讨奋发图强现状，展望具有颇多契机未来，对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未来发展显然是乐观和期待的。

如果用一个研究个案来更深入去了解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状况的话，我们就更能够体会到这份乐观和期许。安焕然〈宽柔：双边缘的奇葩〉的个案研究，提供给读者一个了解处于逆境中自强不息的学院的历史轮廓。新山宽柔中学处于作者所谓的“双边缘”地带，它是五十年代马来西亚第一间拒绝改制的华文独立中学，经历了不断的改革、以及华教运动的风风雨雨，现在成为全国最大型的中学，不能不说是一个马来西亚华文（甚至东南亚华文）教育史上的一项奇迹。但是在未来的岁月中，它并不完全能够渡身于政治风雨和社会是非之外，唯有奋发图强、努力不懈，宽柔中学才能直航不误。

文化之发扬与壮大，有赖于全社会的文化自觉，更有赖于学术的研究扎根。劳悦强〈学与术之取舍：新加坡近二十五年来汉学研究之发展〉一文显然是有感于学院发扬中华文化的责任之重大。他文中分析了所谓“汉学研究”，进一步探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过去二十五年来设计与发展。他关心的是，究竟该系的定位如何，而它课程的设计、内涵等对新马两地学子承传中华文化的影响

又如何？显然，在学术/学科培植（“学”）以及文化义务/社会回馈（“术”）之间，大学中文教育必须作进一步深刻的反思。

第三辑的两篇论文牵涉到新马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戴文雅〈四十年新加坡经济结构的改变〉一文概述了新加坡作为一个弹丸小国必须保持竞争力的必要与事实。事实上，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其实只有四字：发奋图强。作者描述了四十年来新加坡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上所经历的重大改变，从经济发展方案、生产结构、制造业结构等层面，分析了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过去和现在趋势。他同时指出，新加坡人口的老化现象必然会带来对岛国经济上的影响，这显然是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隐忧”之一。

周兆呈的〈从移民社会到“新移民”社会——新加坡华人移民的现代观察兼与马来西亚比较〉提出了新马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新现象，即新移民的大量涌进。事实上，在新马，尤其是新加坡，新移民在一定意义上已构成了一个“移民系统”，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上分别受制于制度政策、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的影响。作者认为，新移民实际上是空间转移、职业转换、阶层转变和角色转型的多重变化过程，而这个现象，将是新马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最后一辑的论文牵涉到新马两地的政治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何启良的〈论新加坡—马来西亚关系〉探讨了新马的唇齿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纠结。其实新马关系历来的纠缠，没有得到两国人民一直期待应有的解决，是双方一种情结在作祟。这是一种若即若离、矛盾的“羡慕、妒忌和鄙视情结”。作者就两国政府对新马关系的态度的差异、马来西亚政策的“随意性”和新加坡的“僵硬性”、

马来西亚政策的“政治历史包袱感”和新加坡的“去政治性”、新马课题与两国内部政治的煽动面等议题分析了新马关系的症结。作者认为，以后两国关系正面的发展，可以经济合作和打恐为基础。

陈剑〈意识形态与新马四十年社会变迁〉认为新马四十年的政治思潮基本上有三股意识形态，它们彼此之间的转变消长，左右了两国历来的政治变迁和发展。首先是共产意识形态和非共产意识形态，其次是利害权衡的民族国家立国方略，第三是民主社会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这些意识形态的博弈、较量，与新马政治史紧密相关。对事实上，新马个别走出不同的政治轨道，正是这几种意识形态互相竞争、互相批斗的结果。

国家治理显然不只是政府的事，它更牵涉到公民社会的参与。潘永强〈远离治理：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当前处境〉一文，除了肯定了公民社会的治理功能之外，亦同时指出了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处境的艰困。作者认为，马来西亚公民社会必须处理本身组织的需要，即建立其自主性和独立性，亦必须与庞大的国家机关交锋与博弈，因此消耗精力太多，实难以有意义地参与社会与国家“治理”事项。作者所谓的“远离治理”，实有感于当前马来西亚政府当局对公民社会在政策上的排挤与态度上轻视。但是，在民主改革的艰难过程中，公民社会的潜力显然是不可低估的。

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在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承上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虽然他们自觉自身是公民社会的一分子，却是最近几年来的事。祝家丰〈权益组织之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质变和分化〉追叙了马来西亚华人社团四十年来的发展与变革。为了争取华社平等，马来西亚华团

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如施压、协商、参党、公民诉求等方式。他们内部显然有不同的声音与意见，因此造成了整个华团运动的质变与分化。作者认为，此一变革，并不完全具负面意义。事实上，经历过多事之秋，马来西亚华团进入 90 年代后期更能配合整体国家政治制度的变迁，进一步凝聚了它们影响力，而成为当代马来西亚民主运动的一分子。

三、

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新马两国曾经结合、分离，形成了两地各自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两国都成为中西文化交汇地区，其中马来西亚本地化特质明显，新加坡则西化文化特质明显。但是新马两国仍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尤其是经济文化领域，两地关系密切，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已相当大，尤其在柔佛州投资非常多。两地贸易往来、人民旅游、探亲、访友等等均日益增多，两地文化交流也频繁，如学术、文艺界交流，新加坡向马来西亚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均不断增加。两国在政治发展上虽然分歧很大，马来西亚政治种族倾向明显，而新加坡政治威权未改。但是民主化、开放社会的理想正符合绝大部分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区域的利益。

现在国际、亚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崛起）形势均有新变化。国际上，不断出现的局部地区政治紧张，甚至爆发战争，由此而造成对国际经济的影响。在亚太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南北朝鲜长期政治分歧，海峡两岸的对峙，中国加入 WTO 后的发展，对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形成巨大压力。在这新形势下，新马两国必受到影响，尤其是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会更明显。过去新马学术人员

对两国问题已有不少研究，但是对两地问题应继续且应有所加强。在一个崭新的趋势，新马问题面临的新课题较多，研究好这些新课题对于两国的未来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这些颇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探讨，在本书各章都有所见，但似乎未能发挥。在议题的范畴里，论文则能论之有据，自成一说。学术贵在多元与自立，我们并不要求论文的观点被每位读者所完全接受。再说，一些旧课题也有充分的再阐释空间。通过对新马社会的具体考察和比较，我们从中看到，不同的政治制度、经济条件、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对一个社群的创新活动和自身命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无疑对推进新马两国社会的了解和全面深化各个领域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发作用。

目次

祝家华	序	
何启良	导论	i
文化/文学		
郑良树	论儒家文化在新马的开发和运用	1
郑文泉	新马分家对“儒家”意味着什么?	13
庄迪澎	马新分家四十年两国中文报业演变比较	33
许文荣	有人与九九幅文学风景比美 一比较马华、新华新生代的书写	47
教育/语文政策		
庄永康	四十年来新马华人面对的“母语”问题	67
梁秉赋	新加坡的双语教育: 1965-2005	89
冯白羽	马来西亚华社民办高等学府的 历程与展望: 1965-2005	123
安焕然	宽柔: 双边缘的奇葩	149

劳悦强	学与术之取舍：新加坡近二十五年来 汉学研究之发展	167
经济/社会状况		
戴文雅	四十年新加坡经济结构的改变	195
周兆呈	从移民社会到“新移民”社会 ——新加坡华人移民的现代观察兼与 马来西亚比较	215
政治/公民社会		
何启良	论新加坡—马来西亚关系	235
陈 剑	意识形态与新马四十年社会变迁	251
潘永强	远离治理：马来西亚公民社会的兴起 及其当前处境	279
祝家丰	权益组织之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 质变和分化	305
作者简介		339

论儒家文化在新马的开发和运用

郑良树

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是从广义方面来说的；换句话说，本文所讨论的儒家文化，是指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所谓中华文化，她包括了儒、道、释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内的一股气势磅礴、容涵性特大的文化，而其中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并作为融合的主体。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里，儒家文化曾经数度退居第二线，由中华文化内的其他文化主导天下；然而经过一两个世纪之后，儒家文化以其强韧的再生力量，重新浮现到第一线，再次主领天下。在中国广袤的疆土上，一些地区自有其文化特色，并不一定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中华文化的其他文化在这些地区内领有主导的地位和角色；然而，经过几代之后，儒家文化以其特有的涵盖力量，包容了这些“边疆文化”，入主了这些“边疆区域”。这一纵一横的事实告诉了我们一件事：儒家文化有无比的包容力以及强大的生命力。

一、儒家的特质

为什么儒家文化有如此强大的包容力和生命力呢？这不得不归功于儒家文化的特质了。儒家文化自春秋时代的原始儒家文化发展到两汉的时候，已经是一股结合阴阳、老庄及法家等思想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而以儒家思想为